

我是在21岁当战士时就和魏巍同志认识了,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参军不久,因试着写一些反映连队生活的小诗而引起注意,被部队驻地天津市文化局(那时叫文化组)借去帮助编辑一张《文艺与革命》小报。文化局院里有一座小楼,楼顶有一间布满灰尘和蛛网的大房子,里面堆满书籍。小楼无人问津,却成了我的乐园。在借调的半年多里,我利用闲暇在那里面阅读了“文革”前众多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魏巍在战争中写下的诗集《黎明的风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在他的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散文作品名扬四海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诗人了;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在战争年代写诗时,用的笔名叫“红杨树”。

谈及魏巍同志的作品与人品,首先还应从他的诗歌说起。他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在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抨击旧社会、同情劳苦大众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秋,17岁的他,在家乡黄河畔写下直抒胸臆的长诗《黄河行》。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去吧,黄河呵/趁着大堤的劲风/载着我们/快快出征”。诗成后几天,他即胸怀救国大志,沿着黄河,辗转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有机会进入延安抗大,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块热土上,他真正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诗的梦想。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军民诚挚情感的氛围中,他诗情勃发,在战斗的间隙,写出以《黎明的风景》为代表的大量诗作。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小引所写:“有一种鸟/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我听到她的鸣声/大地就降落了黎明/苦战的人们呵/你来听听/她此刻正放出快活的鸣声……”而此时的诗人,正如那只鸟,自由地展翅翱翔在血与火的战场,一边战斗,一边吟唱。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抒情与叙事既交错又融合的写法,生动地展现出战地一个连队的诸多画面,诗意地描述了战争的苦难与在苦难中战士们坚定昂扬的斗志。全诗韵律自然,节奏明快,明快中蕴含着悲壮,坚定中又略带忧伤,而诗的主题则是对最终胜利的必信。《黎明的风景》之外,诗人有大量的短诗发表,都是对根据地生活的描写。有对战地极富诗意描绘的《游击队之夜》《蛴蛴,你喊起他们吧》,有表述对战斗热切渴望的《高粱长起来吧》,以及对战士英勇无畏精神的张扬、对军民鱼水深情的歌颂。他的诗,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技巧的炫耀,大都是直抒胸臆,是战士情感的真实流露,其文字浅显、朴实、自然、流畅,看似直白,但却意蕴盎然,既大众化又极具艺术性,意境深沉悠远。他的诗,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他这大量的诗章,构成了他对那场硝烟弥漫的伟大战争全方位的诗的认识和解读。

魏巍原名叫魏鸿杰,参加八路军后改名叫魏巍,到晋察冀战场后,他又为自己起了一个极有特点、极具诗意的笔名“红杨树”。他在晋察冀的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持久”的了。事实上,“抗美援朝”题材也确实是魏巍一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也是最长久的创作内容,它不仅在魏巍的报告文学中成就斐然,在其诗歌、小说领域也独具特色。

抗美援朝街头诗:战争诗歌的鼓动性

1950年11月初,抗美援朝甫一爆发,魏巍便写作了10多首街头诗(另有一首《蝗虫》当时并没有以“街头诗”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篇幅略长的街头诗),这些诗歌如同新中国成立前魏巍的很多诗作一样,极具战争鼓动性。启发民众让他们认清敌人的面目,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动人们勇敢斗争、打败敌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保家卫国的热情等,是这些诗歌的主题。作者告诫走向新社会的青年人们,听到炮声后“不要只知道幸福/不知道仇恨”(《你》),面对敌人,“可怕的/是我们的枪连自己的思想/长满了红锈!”(《锈》);他讽刺美国帝国主义像蝗虫一样“又在一块谷地里落下”,“咀嚼着,跳着”,“还不断把自己歌颂:‘你看我们多么神圣,/我们是上帝那儿派来的神虫。’”面对这样猖狂的敌人,作者鼓励人们“快准备滚去跟火种”(《蝗虫》);因为对这些“得寸进尺的野兽”,“只有它自己的血/才能教训它自己”(《只有》),所以他鼓励人们“去!/把美国鬼子/狠狠地打死吧!”(《去》),激发人们“瞄准”这些“下流无耻的流氓们,因为他们残忍地“把火把举向房檐”,他们的“刀上滴着我们邻邦的血”(《瞄准》)。对于那些勇敢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们,作者则赞美他们“是一个爱祖国、爱朋友的中国人!”(《歌颂》),并希望他们“多抓几个美国鬼子”,因为“这是最珍贵/也是朝鲜朋友/最欢喜的礼品!”(《礼品》)。

这些诗作明快、凝练、通俗易懂、情感饱满,鼓动性极强,让人读来激情澎湃,它们都短小精悍,这在战争时期对于让人民大众了解战争真相、认识战争形势、激发人民大众的战斗热情与爱国热情,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在此之前,魏巍是以诗歌步入文学殿堂的,而且作为一个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深知“作为部队作者,我们还要多写一些鼓舞士气,加强战备,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作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魏巍《牢记周总理遗训》),因此他早期以“红杨树”为笔名发表的较有成就的诗作,无论是长诗《黄河行》《黎明的风景》,还是短诗《好夫妻》《诗·游击去吧》《一个战士的赞歌》等,都通俗、凝练而富有鼓动性、战斗性。街头诗是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观念在延安等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践的产物,它短小、凝练、情感丰富的特点对于激发大众的热情起着良好效果,它像魏巍所说的部队中的“快板诗”“枪杆诗”等战士诗一样,“是我国革命文学中最富有战斗性、群众性的一个部分”,“它在革命战争中,在鼓舞斗志方面,作用很大。”(《战士诗——革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魏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创作的这些街头诗,在激发民众报名参加志愿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斗志、鼓舞人们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起着积极作用的。这些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涉及到的内容,已经包含了鼓舞士气、赞美志愿军美好品质、歌颂中朝友谊、诅咒敌人等后来的抗美援朝文学中常表现的主题,魏巍此后已很少再写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作了,所以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过去战斗性诗歌创作的总

永远的红杨树

□李 钧

诗作都是以这个笔名发表的。在他的诗篇中,有的诗句是明确写给自己、激励自己——“红杨树”的,如《诗,游击去吧》《诗没有死》中有这样的诗句:“战争,难解难分的复杂的风暴/红杨树呵,司令员说/给你十几个同志/带着你的诗游击去吧/呵,在这样的時候/连山里的石头/也难忘今天的苦难/你们还忘不了红杨树/你们还要他的诗/诗呵,游击去吧/永远不要叛变/游击去吧,诗呵/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报答人民。”“红杨树呵,报答人民/记清楚/人民不仅养育你的诗/人民在饥饿里也养育了你/记清楚/在这苦难的年代/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而假若面对着刺刀/我的意志堕落了/诗,我的诗呵/你不过像一片败叶/死于污泥/你叫谁人去哭你!”这是红杨树怎样钢铁般的决心呵!这是怎样的真挚的、让人感动的诗句呵!“叛徒”这两个字,从革命开始直到现今,都是沉重的,让人遗憾和愤怒的,但它不可能绝迹,这就需我们时时警惕。现在揪出的那些“大老虎”们,不就是革命队伍的叛徒吗?

谈起晋察冀根据地时,魏巍曾说过:“晋察冀那鲜血与战火浸染的土地与生活,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成长、成熟的摇篮,也是我们共和国的摇篮,同时又是我们那些写诗的青年成为诗人的诗歌的摇篮。”魏巍正是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这10年的战斗生活,在革命队伍中血与火的锤炼,在与人民群众在生死面前的血肉联系中,一步步确立并坚定了人崇高的理想与信仰,奠定了他一生不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铸就了他的文学观,确保了他的作品始终不变的导向与风格。到解放战争后期,魏巍已成长为骑兵团的政委,他骑马率部挺进大西北,一路上依然与诗神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调京工作,但他的写作依然是业余的,笔下的文字依然与党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几次奔赴朝鲜,冒着炮火在前线采访,又一次次被战士们的行为与情感深深打动,写下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作品。当时,《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与整个社会引起的轰动可谓空前。《人民日报》特别将一篇文学作品刊登在第一版。随即,毛主席看过后,指示印发全军。朱总司令读后,连呼“写得好!很好!”在其后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总理专门提起《谁是最可爱的人》,并以此

号召文艺工作者“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周总理还特意提出要认识一下魏巍这位朋友。这篇散文对志愿军的鼓舞和在人们群众中的反响同样强烈。当时,“最可爱的人”几乎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而在日后漫长的时间中,“最可爱的人”也成为解放军中英模人物的称谓。这篇散文也一直在中学的课本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后被全文镌刻在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碑上。

在魏巍成为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后,又写出一大批青年题材的思想政论式的散文,这些作品像“最可爱的人”一样,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就是一例。这篇文章是1955年他在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送别毕业班同学石油地质前线的讲演。正是这次讲演,这篇散文,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那些热血青年,他们满怀激情地奔赴祖国四面八方的艰苦荒凉的石油前线。直到30年后的1985年,当年魏巍送行的同学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他们特别邀请魏巍同志参加。这群现今已年过半百的人,激动地对他述说着30年不忘的心迹,畅谈当年受他作品的激励鼓舞,毅然奔赴祖国最荒凉、最艰苦的石油前线,成就了30年的奋斗经历与业绩。当时的热血青年,现在都是石油战线的工程技术骨干或中上层干部。但他们的情怀一如既往。他们争相把自己获得的石油大会战纪念章、各种立功奖章送给魏巍同志。一位女同学还拿出珍藏30年的刊登《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的1955年第11期《中国青年》回赠魏巍。那场景的真挚、热烈,让魏巍激动不已,很快写出散文《这就是我们的哲学》予以回报。其后他们每10年聚会一次,都请魏巍同志参加。笔者有幸同魏巍同志参加过一次,那次魏巍同志生病了,是带着氧气去的。那真挚热烈的场面,令笔者唏嘘不已。当年,魏巍发表这一批散文后,曾收到全国各地青年雪片般的来信,想每一封来信的后面,都有一个激昂奋发的故事吧。就连《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200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偶然见到魏巍时,亦难掩如小青年一般激动不已的心情。尽管那时范敬宜已72岁,而魏巍已83岁了。范敬宜其后专门著文说,半个世纪来,我一直想能见到魏巍,是他上世纪50年代的文章,激励我大学毕业时主动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而毅然奔赴东北的白山黑水间。范敬宜在东北虽也受了不少

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张自春

结。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诗作,对于让人们“更加珍重我们的斗争成果,热爱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祖国”(《两年后记》)还是有启示作用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战争中的亲身体验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文学创作中影响和成就最大者,恐怕也是抗美援朝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魏巍在第一时间写作了上述的街头诗作,也在第一时间被派到抗美援朝前线了解美军思想政治情况,任务完成后,好奇心驱使他深入到战斗前线进行访问达三个月之久。回国后根据其感触,魏巍写作了十来篇通讯报告。这些通讯及时反映了奋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况,尤其是对他们在战争中热爱朝鲜人民、面对斗争奋不顾身、同志之间相互关爱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的表现,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大,当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该篇为名将这些作品集出版。几个月后,魏巍再次赴朝鲜前线采访半年多时间,又写了部分通讯,1954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增入;1958年,志愿军回国前后,魏巍再次到朝鲜采访后又写了几篇抗美援朝通讯报告,又收入1959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到该书中收录的抗美援朝通讯共17篇。这一系列报告文学确立了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的时代形象,及时宣传和赞美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让作者极力赞赏和主张的“革命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得到广泛关注。作品中既有家人惨烈被害却坚强活着并积极为打击敌人贡献微薄力量的朝鲜老人和小孩,也有奋不顾身救助朝鲜灾民的志愿军,更有在前线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怕牺牲的士兵,也有不怕艰苦、坚韧、富于奉献精神的女战士;它们既表现出了中朝人民互相爱护和帮助的深厚友谊,也表现出了战士们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还表现出了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在艰苦的前线不要忘记祖国人民幸福的高尚情操,以及在战争生活中凝结成的中朝军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谁是最可爱的人》系列报告文学中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激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任何敌人都压不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魏巍《青春的诗篇》),正是1950年代刚刚从几十年的战争中解放过来的人们所拥有、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这些“革命英雄主义文学”,是作者几次深入战争中深刻体会出来的,是“部队生活生生的写照”,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魏巍《谈谈报告文学》)。据说,当时战斗在前线的士兵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后,觉得“浑身是力量,即使横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国鬼子设下的二十公里宽的火墙,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一冲而过的。”而另一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的篇名,被很多青年当

苦难,但他从不言悔,终于成就了他的事业,为国家 and 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说:在我青年时期“是魏巍的文章使我懂得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他最后写下一句极富诗意的话:“燃烧激情已经变为悠长的恒温”。这就是魏巍作品的影响与力量。

魏巍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特点,是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长久交往并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上世纪90年代初,当得到《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述的李玉安“烈士”没有死的消息时,魏巍激动不已,急切地写信联系并与之相见,很快成为真挚的朋友,其后又满怀深情写出散文《他还活着》,记述李玉安几十年隐姓埋名、坚守本色的可敬行为。而在此前,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述的马玉祥、井玉琢及当年的营长王宿启已交往几十年。在《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中,他记述了志愿军连队文化教员戴笃伯,其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是朋友,戴笃伯转业回湖南后,魏巍还不远千里去探访他。与烈士胡鄂生的女儿胡继红的来往,则是情同父女。在他晋察冀的诗歌中,曾记述过的一位在解放战争战场英勇无畏的战士徐清华,到上世纪90年代,回乡务农的徐清华因生活极其困难,辗转找到魏巍。魏巍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给当地政府写信,介绍情况,并自己资助徐清华同志,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魏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又不仅仅是他笔下的人物。他可以为可敬的王震将军撰写碑文,也心甘情愿的为一个乡村党支部书记张振山树碑立传。在“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有生之年,他几十年坚持去探望,给老人过生日。而对冀中的另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刘大娟,她虽没有戎冠秀显赫的名声与贡献,但她在战争年代一样无私地支援八路军,长期烧水做饭、缝缝补补、传递消息,魏巍依然像对母亲一样敬重她。一直保持着与老人的亲密联系,半个世纪间,常常专程去看望她,坐在老人的土炕上,与她拉家常。甚至在他儿子结婚时,还专门带着儿子、儿媳到老人处“认亲”。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在魏巍作品中出现的诸多英模人物中,几十年,无论时事怎样变迁,没有一个变得或落后,或颓唐、变质了,或成为腐败分子了。没有,一个也没有。倒是有个别生活困难的,有为了不给国家找麻烦,甘愿去做修鞋匠的。他们一生都在默默奉献。

反映的内容博大精深,具有全面反映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效果。作品涉及了战争、中朝友谊、国内的合作化运动、爱情等主题,英雄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魏巍抗美援朝作品中一如既往表现的内容,所以小说不仅塑造了以郭祥为主的英勇战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还塑造了邓军、周仆以至彭德怀(虽然与其相关的内容是1985年重版时增加)等军队领导者的形象,朝鲜人民金铁银、朴淑贞等的形象也塑造得很丰满。更有特色的是作品塑造了杨大妈、小梨等大后方、祖国建设中的农村领导者形象,以及陆希荣、李能这样曾经积极参与革命,革命胜利后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引诱而蜕变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轮廓综合反映出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复杂性。

魏巍在谈及他创作《东方》时说,因其“光写几篇通讯不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连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写这么一个长篇。”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有二:第一是为为了激发人们的革命战斗性,发扬革命精神;二是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准备。《我是怎样写〈东方〉的》可见作者将小说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写出人物的“共性”更注重写人物的“个性”,是想要从各个方面艺术地反映抗美援朝这件事,以达到对其进行总结的目的。如果对照着作者的朝鲜通讯和当时的战地采访日记,可以看出,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是作者力图表现的内容,因此,小说中不仅大胆反映了爱情,人物形象塑造也真实而不片面,小说情节也较为逼真、有生活气息。

有评论家曾总结道,“《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握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马蔭伯《魏巍创作谈》)丁玲也曾评价这部作品“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我读〈东方〉》)这些评论都是中肯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看作是抗美援朝的一种“全景图”,它不仅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史诗”,也是几十年来抗美援朝文学的沉淀与总结。

魏巍一生都在坚持文学中的“党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忠实实践者,为了写《东方》,他曾经到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过广泛调查研究,因此强烈的时代特色、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动人心弦的时代情感,是魏巍文学创作的最有力的特点。魏巍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尤其是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谁是最可爱的人》赢得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内的国家领袖的喝彩和赞赏,丁玲则称“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魏巍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其一生创作绝不仅仅局限于抗美援朝题材,但是其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在于他深入体验了这场战争,对它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以极强的文字能力表现出了这场战争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抗美援朝,恐怕也得阅读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